

目 录

碧眼看红墙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满洲国

一 孩子总是孩子嘛	3
二 进入俄国	7
三 莫斯科幻想曲	11
四 话剧	17
五 横穿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	23
六 祝蒙古繁荣昌盛	29
七 火车脱轨	35
八 哈尔滨	42
九 溥仪	46
十 奉天防空演习	53
十一 艺妓晚会	60
十二 热河	67
十三 祈祷	72
十四 与诸神同在的一个下午	77
十五 要塞重镇	82
十六 重逢在锦州	86
十七 日本强权下的和平	89
十八 突击部队	93
十九 行军第一天	98

二十 天气转暖	103
二十一 布谷鸟!	109
二十二 热烈欢迎	115
二十三 两个被绑着的男人	120
二十四 远赴南方	126

第二部分 红色中国

一 锤子和镰刀	131
二 在途中	138
三 中华之都	145
四 部长和传教士	149
五 圣山	155
六 大元帅	161
七 大饭店	164
八 变节者	170
九 三百万人严阵以待	175
十 智取	180
十一 天堂	185
十二 毛瑟枪的枪声	190
十三 梦魇	193
十四 挡风玻璃上的雨水	198
十五 铁路和公路	202
十六 可爱的河流	208
十七 再见	215
十八 从日本到曼哈顿	220
结 语	229

第一部分 满洲国

PART ONE: MANCHUKUO

孩子总是孩子嘛

我总是爱看(我知道我以前说过这事)《泰晤士报》上的私事广告栏。

现在,我正在看这个栏目。那是1933年6月2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英格兰的田野,明丽怡人,纵横交错,从哈里奇港水陆联运火车的车窗外飞掠而过。一幢幢乡村小屋的屋顶上升起缕缕炊烟,凝成细细的烟柱,袅袅腾绕着融入炎炎蓝天里。牛群聚集在树阴下,甩动尾巴,驱赶着初夏的苍蝇,动作安谧而优雅。一条小溪旁,一位老汉正在认真地安装钓鱼竿。敞篷车在大路上欢快地飞驰而过,车上载着高尔夫球棒、网球拍和野餐篮。吉普赛人在白垩矿场扎营露宿。一只绿色的啄木鸟斜飞过田野,但我听不见它的笑声。小草坪上,两个孩子正在逗小狗玩耍。远处微微突起的丘陵草地朦朦胧胧。这是英格兰最美丽的季节。

我,正站在离乡远行的起点,觉得还是无视眼前的美景为宜。我又继续看私事广告栏。

栏目里的内容中肯恰当,但不是非常鼓舞人心,就像上个星期天的布道。

“由于此事十分不确定且费用格外昂贵,因此,我只得等待,只得相信。”发布这则消息的人没有透露姓名。

我放下报纸。通常情况下,我会花上一点时间对产生这种呼吁的

本书中的满洲国即伪满洲国,1932~1945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制造的傀儡政权。——编者

情形做一番猜测。但是,今天,我却将之作为神谕的指引,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它。我们——我和那个信息发布者——处境相同;正如他(也许是她)所说的那样,我们只得等待,只得相信。

我的打字机放在对面的行李架上,上面垂荡着一个行李标签,满不在乎地来回摇摆着。标签上写着“去满洲的旅客”。我希望那标签不要来回晃动。在如此平和而规律的摆动中,存在着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标签上的说明一跳一跳,令人啼笑皆非。“好吧,好吧!”标签说,口气中既带着几分怀疑又神气十足。“孩子总是孩子嘛……”

“去满洲的旅客”。如果车厢里还有其他旅客,如果他能够破译我的黑体大写字母,如果他精通远东的地理和国际政治,那么,光是那个行李标签就足以使他相信(因为他显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小伙子),我即将迎来的日子似乎既不确定又代价昂贵。因为满洲里是个交通枢纽,位于俄国和满洲边境,位于横贯西伯利亚和华东铁路的交汇处。不久前,华东铁路已被关闭,因为莫斯科和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政府对其所有权发生了争议。简言之,根据已有的证据,我假想的旅伴一定会认为,我不是马上就要倒霉,就是厄运即将来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赤道也许没有起始点之外,一切事物皆有源头。太多太多的游记作者开门见山,开篇的头一句话就直言不讳且戏剧性地告诉他们说,独桅三角帆船的船头触在沙滩上,他们轻轻地上了岸。

毫无疑问,那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出游?有什么借口?他们事先采取了哪些其他步骤?促使他们游历千山万水的原因是对生活的厌倦,是做生意的需要,还是伤透的心?我们有权知道。

但是,他们很少告诉我们。他们或许会恩赐般地提供沾沾自喜的只言片语,谈及他们所谓的漫游癖。但是,他们主要是利用了一种宿命论的气氛;他们不可一世,不可思议,神秘莫测。甚至连“嘿!”或“喂!”都不说一声,他们就匆忙地把我们从他们的祖国带到了他们去过的异域他乡。因此,在阅读游记的头几个章节时,读者的头脑中一

定充满了许多互不相干、令人困惑的猜测，正如一个学监看见该大学的某个古老的纪念碑顶上放着一只夜壶时，一定会生出种种猜测一样。他忽略了情景本身固有的有趣之处，因为他正在痴迷地捉摸，那情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且不论其他方面，在这个方面，我打算公平地对待读者。如我的行李标签所示，我口袋里揣着一张去满洲里的车票。读者也许会疑惑，我为什么买了这张车票。

我可以使他相信，买这张车票并非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有什么喜爱之情。满洲里是一个经常遭受大风侵袭的小村庄，位于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上，那平原自然也免不了遭受大风的侵袭。那儿的居民有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苏俄和白俄）。1931年秋，我在那里耽搁了一天。在那一天中，我看到了我想看的满洲里的一切，还有环绕着村庄的纵横交错的浅壕沟，至于那些壕沟是用于灌溉，公共卫生，还是用于防御，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满洲里，我还读完了《匹克威克外传》的一大半，不过，看小说是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的事情。尽管如此——如我所说——我还是读了那本书。不，要是说满洲里在我心里引起了（比如说）肯塔基在萨克斯管演奏者心中，或博格诺里吉斯^①在招贴画艺术家心中引起的那种感情，那是既无根据又不诚实的。“到满洲国去”的运动不必算上我。

那么，是什么情结？不会是怀旧吧？原因很简单：由于人们认为满洲里东面的铁路已经关闭，买一张去（比如说）哈尔滨的票很可能就是浪费钱。能去满洲里的运气微乎其微，不过，我的运气非常好。在满洲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界分两个国家的边境上，那两个国家的人民，总体上来说，既不讲究效率也不奉行廉洁。因此，无论铁路的局势多么严重，毫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人们都在尽力想办法继续向东行。

但是，为什么要继续向东行呢？我们终于切入正题了。

① 英格兰南部一自治市，属西萨塞克斯郡，海滨游览胜地。——译者

我口袋里装着——或者，非常准确地说，我以为我口袋里装着——写着“致所有有关人士”的一份文件。（幸运的是，因为我忘了带上它，所以它也就与任何人无关了。）这份文件的正文里写道，我被授权作为《泰晤士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我是以下列方式获此授权的：

在此之前两个月，我去见《泰晤士报》的编辑，告诉他在即将到来的夏季，中国的局势将会充满可以想象得到的种种有趣的情况。（这是一个弥天大谎，1933年夏季的中国局势像水沟里的水一样死气沉沉。）我大言不惭地暗示，我将是向全世界介绍这一局势的人。如果我在之前没有去过那里，并待了将近三个月的话，我能那样说吗？

《泰晤士报》的编辑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首先是为他的同行们着想。“如果我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就会四处去纠缠他们。然后，当他发现没有一家声望卓著的报纸愿意给出到中国去的理由时，他便会回来找我，提出荒诞无稽的理论，说厄瓜多尔是未来之国。我最好还是立即把他弄出国去。”

他这样做了。我被正式指派去撰写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影响重大，一篇比一篇内涵丰富。这些文章的稿酬甚丰。《旁观者》预付了我 50 英镑。我的发行人，一个好奇心重但容易上当的人，支付了一大笔其余的必需费用。我非常感激那些为我支付路费，使我能成就此行的人们。

这就是我怎么会出现于哈里奇港水陆联运火车上，起程去满洲里的经过。我已作了坦诚的交代。如果读者们觉得我还有什么其他动机的话，那他就自己去想象吧。

进入俄国

荷兰。在弗拉兴月台上,高大的役马,就像人们在日本看到的那种役马,帮着脚夫拉运行李。火车驶离车站,沐浴着夕阳的光辉,穿越平坦的乡村,乡村里一片片对称的田野,相当美丽迷人。但是,原野过于平坦,隐私和惊奇——这当然是文明景色中的两种主要品质——荡然无存。在我眼里,荷兰显得索然无味。

然而,隔壁车厢里来自伦敦东区的两个小女孩并无这种感觉。她们是到柏林去,但我不知道她们去那儿的原因。她们把经过的每一个车站的站名依次记在一个练习本上。“噢,瞧!”一个女孩喊道,“一个真正的荷兰女人!”老天作证,她说的没错。

我和一个讨人喜欢的英国小伙子一道进餐。他说他了解华沙,于是我们开始谈论有关1921年上西里西亚公民投票的事情,但是,很显然,是他的一言堂。当得知我的使命时,他大感惊恐。“满洲!”他惊叫起来。“但是你会说俄语,或者汉语或者日语吗?”天啊,我都不会。“那你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他满怀敬意地看着我。这家伙是个拼命三郎,他一定这样想。显然,他觉得我是个韦达^①式的人物。现在我真希望我没有把我的目的地告诉他。

我希望我没有把我的目的地告诉他,因为其他人利用某人的行动造成的虚假价值常常令人十分窘迫。我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区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鉴于此,满洲里之行是一次完全正常的任务,毫无令人激动之处。但是,整个世界却死守着一套价值观,而简化的

① 韦达(1839~1908):英国女小说家,以写上流社会生活的传奇式作品闻名。——译者

旅行手续,以及大多数标准的外部经验形式早就使之过时了。这种巨大的差别依然具有令人尴尬的罗曼蒂克般的明快旋律,距离所产生的某种魅力,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由于距离本身所致。

我们互道晚安时,小伙子祝愿我在历险途中好运。我不知道他的祝福能否灵验。

正合我意的是,柏林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人们相互交谈着,说的都是有关集中营的可怕事情,有关大人物之间的阴谋与争斗,以及源源不断的讽刺希特勒的笑话。不过,这全都是在侍者听不见的时候才说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看看黄油块上是否有纳粹党党徽万字符。

我和惠勒·本尼特、尼可鲍克和(休假后回莫斯科途中的)杜兰迪一起共进午餐。我没能完全掩饰我对整个欧洲政治和大部分其他地区政治的无知。在场的还有一位美国影星,他一直在格陵兰岛拍电影,因而充满了激情和耐性。那里的气候条件相当恶劣,两只进口的北极熊死于冻馁,为他们的艺术捐躯了。他给我讲述了我有生以来所听到过的最长的关于手术的故事,他会长久地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里。

在试图注射预防针未果之后,我乘夜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穿过一道拱门,驶过了波兰边境。那个拱门上用俄语写着的一句话,告诉人们:“革命摧毁了一切障碍。”这句口号的真实性并非显而易见。

涅戈里罗耶海关装饰着巨幅壁画,表现的是投身于工农业生产的人物,正在履行着各种繁重的职责。他们管状的体形和欣喜若狂的面部神情结合在一起,显得有些滑稽。四周墙上用金色大字镌刻着四种语言的“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已经成为不朽箴言的第二句话——“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被省略了。我在1931年的日记里写道:它表明的是“对人们在那个地方可能遭受的损失极其保守的估计”。

然而,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毫发未损地通过了海关,只不过耽搁了一些时间。海关官员就像两年前一样,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合逻辑的神气处理着事务。我想,俄国历来都不是很擅长于行政管理。今天,她的工作人员受到新的公民意识的严厉约束,正不乐意地处于两种身份的变换之间。一方面,他们相信宿命论的天性使他们对待工作敷衍了事,到了月底篡改一下实际情况交账就行了;另一方面,上级强制灌输的准确的、普鲁士式效率的理想又在激励着他们追求更高的目标。出于爱反省和自我批评的本性,普通的俄国官员不无痛苦地明白,他生来不是填写表格的——或者说,正确地填写表格。他是一个哈姆雷特似的人物,他和旅行者的关系会不可预测地从武断转向茫然,从道歉变为威胁。他往往和蔼可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从来做不到利落敏捷。

我弟弟伊恩最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麦特罗-威格士工程师审判案期间,他担任路透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他给了我一份斯大林给他的信函的影印件,作为护身法宝。斯大林很少与外国人通信,他的签名引起了那些官员们孩童般的好奇。我只是随意放在手提箱的最上面,要是放在里面的话,他们也就不会看见了。当他们看见一本装有巴西中部土著部落照片的影集时,他们的表情由惊转喜。那些照片真是我拍的吗?真的吗?照片真是拍得很棒,非常有趣……看起来,就连布尔什维克也自以为是旅行行家。

我以最友好的方式与那些官员们告别,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儿忐忑不安,因为我的口袋里揣着 200 卢布。这些钱,就像斯大林的信一样,是我弟弟伊恩给我的,它们属于违禁品。

此刻,我们要谈的是所谓的外汇问题。这是我永远也闹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渴望把它弄明白。要是能够写一篇,或者读到一篇题为《法郎的未来》或《比塞塔:何去何从?》的文章,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但是,我知道我永远也写不出或读不到这样的文章。

在俄国,外汇是一个特别虚幻而复杂的恶魔,在此,我不想解释金

卢布和黑卢布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不知道区别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区别。我惟一能肯定的是,如果你被发现将卢布带进俄国的话,你便会被捕;我还知道,如果你按照官方汇率兑换你的外币,你得不到你应该得到的等值的卢布。(为了消除你的怀疑,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涅戈里罗耶海关兑换的10先令,还不够我付脚夫小费,假如我雇脚夫的话。)所以,最经济的策略就是偷偷地将卢布带进俄国,即使这并非最精明的办法。伊恩给我的200卢布使我在俄国通行无阻。

当然,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俄国人也设计了一套最严厉、最全面的规章制度。进入俄国时,你必须申报随身携带的所有货币,离开俄罗斯时,你必须出示收据,以证明你每天花费的数目(一般是20卢布)。这听起来似乎严密得滴水不漏。但是,如我所说的那样,俄国人历来都不是很擅长于行政管理。此外,在我穿过他们国家的两次旅行中,我也没有看到这些规章制度有效地执行过。看起来,倒腾卢布可以成为年轻人有潜力的生意,干这一行,风险小且利润空间大。

三

莫斯科幻想曲

当我们穿过波兰边境进入俄国的时候,小个子列车员说:“欧洲过去了。”过后,好像是六月天了。灰蒙蒙的天空和冷飕飕的风丝毫未能增添莫斯科的魅力。

莫斯科是个沉闷的地方。在我看来,莫斯科的气氛在某些方面会使人联想到仆人的卧室。不过,我没有本事去追溯这个比喻。

英国公众对俄国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方面,大多数死硬派认为俄国是人间地狱;另一方面,少数经历不多的人认为俄国是正在创造之中的人间天堂。他们双方各执己见,既坚决又狂热。双方都错得不可救药。

但是,有谁会去指责他们呢?不考虑所有的证据,人们便无法做出公正的定论。遗憾的是,在大不列颠,能拿出的证据极其有限。我们的大报^①通过其派驻在俄国以外的记者不断地报道着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发生的事件,因此,该报有关俄国的新闻所具有的趣味性和可靠性,恰如在艾尔伯特纪念馆的台阶上对在艾尔伯特大厅里举行的拳击赛进行的实况报道。美国人对俄国的了解比我们要全面,没有那么多歪曲,尽管有时候会被感情迷惑了眼睛,因为美国报纸刊登的有关俄国的新闻比我们的多,而且更加真实。如果不是宽阔的太平洋,他们的态度也许不会那么超然,令人称道。但是,至少他们没有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因为他们没有在不了解全貌的情况下对一场规模

① 我应该补充的是,报纸的政策部分地是由苏维埃当局的态度决定的,该政权虽然不存有敌意,却很专制。——作者

史无前例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实验预先做出判断，然后又全然无视。

在英国，研究俄国问题的专家在人数上和研究火星的专家差不多，而且这两者对其领域知识的了解同样确切和全面。十分有趣的是，这种情况在俄国也基本相同。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小撮人，也许是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和部分犹太人吧，（从理论上说）控制着幅员辽阔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除此之外，在俄国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或者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当然，他们知道那里应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教育和宣传——在俄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两个领域正在变得日益难以区分。他们脑子里灌满了各种信息，但却极度缺乏事实真相。他们可以研究历史，但只能是列宁希望发生的那种历史。他们可以了解目前的局势，但只能是斯大林认为可取的那些内容。事实上，他们的国内新闻对未来的关注几乎和对眼下问题的关注一样多。他们在报纸上宣布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十个项目。引人瞩目的是，俄国即将不断地成就无数伟业。

我无意嘲笑俄国的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的任何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可笑的，而且最辉煌的事业在其初期也常常是最富喜剧色彩的。我建议那些鲁莽而急于批评苏俄的人——不计其数的挥舞大棒作武器的人，他们认为整个俄罗斯帝国都是些横行霸道的人在当道（他们称其为“大砍刀”），《笨拙周报》的漫画家给他们配备了皮鞭和炸弹——采取“让狗看见兔子”的态度，才是明智而公平的。我建议俄国人，现在该是他们放出兔子的时候了。

凡是在俄国旅行的人，哪怕是随便走走，都会对她所进行的宏伟事业深表赞赏。那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实验并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项以政治和经济为主的实验。那主要是一项心理实验。你可以认为，这里多数人缺乏具有能够为五年计划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民族特性。他们大多数人天生就不讲效率，不负责任，对什么都不在乎。与民族特性和世界观这些最根本的因素相比，建设一个理性化和工业化的俄国——人民落后，国家缺乏交流和资本——过程中的大量实际

困难只不过是些小小的障碍而已。俄国农民会像机器人那样受到刺激吗？在一阵热情的巅峰或者在格伯乌（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武力威逼下，他会抛弃他漠然的天性，抛弃他那迷人而无望的不合逻辑，变得有冲劲、有进取心吗？

看起来，他可以一时地部分地做到那一点。事实证明，普鲁士-美利坚式的动力和效率理想是有感染力的。他们取得了进步。一个众所周知由空想家组成的国家向世人表明，他们能够足尖抵在起跑线上，勇敢地行动，准时上下班。哎，但这一切常常搞错。尽管姿态摆错了，但姿态背后的意图却无可挑剔。

这种姿态会成为一种习惯延续下去吗？俄国人会把自己转变为机器人吗？访问莫斯科的人心存疑窦。但是，人们的疑惑越来越少。旅馆里的浴室不能使用。抽水马桶正在修理。电梯坏了。服务质量差得可怕。打电话不可能。只有一根需要划三次的火柴……

最后，人们的疑惑统统停止了。

我得遗憾地说，我极其不谙观光之道。我的遗憾，我想补充一下，是诚挚的。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如今，为观光的效率感到——甚至承认——自豪，意味着为自己心仪的东西而不是猎奇获得了经费。在正被卷入标准化大漩涡里的世界中，在条条路径都已有人走过的一个同心圆的迷宫里，富有经验的旅行者用心地炫耀着他在群体中的独立性。“当然，”他说，口气里带着轻蔑，强调着他下意识的傲慢，“那个地方非常偏僻——完全不是外国人去的那种地方”，或者，“我恐怕得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不正确，我们只是在本土探究我们自己的事情。这一点都不累……”他想与众不同，便狂躁地远远避开庙宇和陵墓，教堂和宫殿——所有给当地带来名声的光荣不朽的标志物。人们不会在奈何桥上看见他死去。对于他来说，凝视金字塔像吹凉他的茶一样不可原谅。

但是，我并不是这种人。我怀着一个诚挚的、尽责的愿望去做那

些正确的事情,直到我出发之前的那一刻,我仍然打算继续做那些正确的事情。但是,我懒惰——不仅懒惰,而且完全缺乏历史感或者缺乏对建筑的领悟力。只要提起中国的长城,感情丰富的鲍斯韦尔^①便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不会那样。看见任何宏伟的建筑物,无论多么壮丽,无论蕴涵着多少历史联系(如他们在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所说的),只会让我感到窘迫。这刺激了我的自我批评能力。导游如数家珍的那些年代和名字为什么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么多年之后,我为什么还是无法有把握地区分葱形穹顶和祭坛背壁雕饰之间的不同?还有,亨利一世(捕鸟者)^②究竟是何许人也?

我忠实地睁大眼睛看世界,但是兴趣索然,徒劳无益。

因此,尽管我在莫斯科逗留了四天,或者说,比那些打算写一本关于现代俄国的书的人认为所需的时间几乎还要长一倍,我应该看到的東西一样也没有看见。我只能告诉你,莫斯科看起来像混沌未开时期。

一方面是《晨报》发表的照片,另一方面是苏联国际旅行社旅游代理商的宣传,真实情况介于两者的宣传资料之间。莫斯科是个单调但并不荒凉的城市。一开始,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似乎摇摇欲坠,且空气浑浊。然后,你会意识到,这并非衰败的征兆,而是重建的迹象。为数众多的建筑物已被推倒一半,还有许多建筑已完工了一半。竣工的新楼可能比你想象的数量要少。照片上看起来非常漂亮的那些具有未来主义风格的复杂的公寓住宅区,在建筑风格上几乎是一式的单调乏味。街道上冷冷清清,使人害怕,而且路面状况很糟糕。有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充斥在戏院两边的侧厢,好像时间尚未确定的

① 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著有英国作家《约翰逊传》和《科西嘉岛纪实》。——译者

② 亨利一世(捕鸟者)(875~936):德意志国王(919~936)、萨克森公爵(912~936),萨克森王朝的创建者。——译者

即兴演出。

说来奇怪,你会发现莫斯科人十分乏味,又十分可爱。他们的宿命论制约了他们的好奇心,陌生人心怀感激地发现没有人盯着自己看来看去。譬如,英国人拿着手套和收拢的雨伞穿过纽约的大街时,会恼人地感到自己仿佛是一种稀有动物,而在莫斯科大街上闲荡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他的穿着比他见到的任何人都要考究,他显然是稀有动物,是个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人过多地去注意他,他不会感到自己是个怪人或入侵者。

莫斯科人的穿着既不漂亮又没有特点。除了男人经常穿的宽松上衣之外,他们的衣服都是按照标准的欧洲式样一成不变地剪裁而成,但很拙劣。不管怎么样,在市中心却看不见衣衫褴褛的人,没有赤脚的人,没有瘦骨嶙峋的人。街道上永远都挤满了人,但却千人一面,难以区分,也没有兴奋的表情。人群流动着,小心谨慎地交谈着,在有轨电车站和合作商店外面耐心地排成长队。在人们的眼睛里,你看不见非常明确的希望,只是有时候会看见绝望。这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群。毫无疑问,现实需要人们冷静沉着。

关于现代俄国,其中最令人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女人普遍丑得惊人。布尔什维克主义似乎与美是不相容的对立面。跨过边境,你就会发现,哈尔滨和上海的夜总会里触目尽是秀色可餐的绝色娇娃,清一色的俄罗斯女郎。但是,在莫斯科,你要找个美女犹如海底捞针,甚至连找个脸蛋说得过去的姑娘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对俄国统治者的英明睿智,你想不景仰都不可能,他颁布法令规定,在苏维埃的公民中间,婚姻不应被视为永久性的。我看不出该法令如何得以实施。

即使在戏院里,你也会感到茫然。俄国女演员对待她的艺术生涯很认真,认为必须经过多年的精心培养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我们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女,还未成年就站在聚光灯下了,在俄国找不到这样的人。莫斯科不会对30岁以下的明星表示任何敬意,